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论秦墓仿铜陶礼器的兴衰
——以关陇地区秦墓为中心

赵珂艺
（北京 100101）

摘要：仿铜陶礼器作为青铜礼器的陶质明器替代品，在秦墓中的使用早于东方诸国。本文关注东周时期关陇地区中小型秦墓中的仿铜陶礼器，其发展脉络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呈现出从学周礼到废周礼的转变；变化的原因在于，早期为构建华夏正统地位积极学习周礼，战国中期以后为适应社会转型需求转而摒弃周礼。

关键词：仿铜陶礼器；关陇地区；秦墓；周礼

中图分类号：K871.41　　**文献识别号**：A　　**文章编号**：1001-0327（2026）04-0116-10

仿铜陶礼器指模仿铜礼器制作的陶器，在器形、纹饰、组合等方面均与铜礼器相似，是具有礼制功能的陶器[1]。仿铜陶礼器出现与流行的原因需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讨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发现具有明显模仿铜器风格的陶礼器，可视作仿铜陶礼器的源头[2]。殷墟四期随着社会中下层观念的改变，出现一批以仿铜陶礼器代替铜礼器随葬的墓葬。西周早中期，在丰镐、周原等地一部分中低等级贵族墓葬随葬仿铜陶礼器，多为殷移民。西周中期后数量锐减[3]。东周时期三晋两周地区仿铜陶礼器墓始见于春秋中期[4]，在洛阳、郑州、晋南等地区有少量发现，至战国早期仿铜陶礼器墓大量流行。而秦国在春秋早期，早于其他地区率先在墓葬中使用仿铜陶礼器。

秦墓随葬仿铜陶礼器的现象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学者们围绕仿铜陶礼器的形制特征、器物组合演变[5]、墓葬分期分类[6]等关键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墓葬等级序列的划分，通过对比青铜礼器墓与陶礼器墓的随葬品差异进行等级判定，尚未形成对秦墓仿铜陶礼器发展演变规律的整体性考察。秦墓随葬仿铜陶礼器的习俗始于春秋早期，至春秋中期开始呈现扩散趋势，战国早期达到发展高峰，此时超过半数秦墓中出现仿铜陶礼器组合。然而这一丧葬传统在战国中期发生显著转折，随葬仿铜陶礼器的墓葬数量急剧下降，至战国晚期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值得关注的是，不同时期的仿铜陶礼器组合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礼器具有鲜明的政治化特征，是以体现享有国家或贵族的不同等级的权力为表征的特殊器具。礼器与礼器组合的差异代表了贵族等级高低，也体现了国家与贵族政治权力的分配制度[7]。仿铜陶礼器作为这一时期秦墓礼器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礼制形态的物化表达，更因其特殊演变规律，为探讨秦国社会等级流动与权力重组提供了独特的考古学视角。

划分墓葬等级是讨论不同等级人群随葬

作者：赵珂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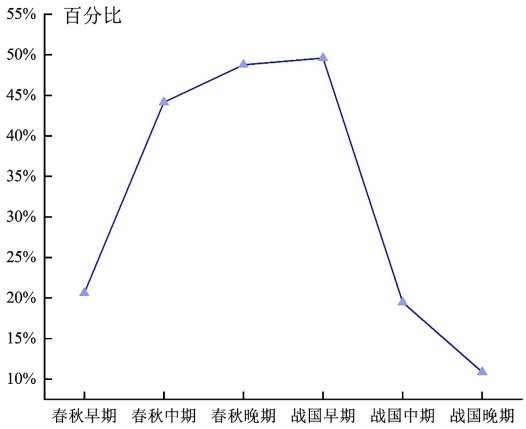
仿铜陶礼器的差异及变化的重要前提。已有多位学者对秦墓分类提出标准[8]。本文参照以往秦墓分类标准，以随葬品种类为主要指标，同时结合墓长、椁长、随葬品数量等信息作具体分析。考虑到铜五鼎及以上墓葬几乎不随葬仿铜陶礼器，按照铜鼎数量进一步对随葬铜礼器墓葬进行区分。可将中小型秦墓分为以下四类：甲类墓葬随葬铜5鼎；乙类墓葬随葬铜1–3鼎或其他铜礼器；丙类墓葬不随葬铜器仅使用仿铜陶礼器；丁类墓葬仅随葬日用陶器或无陶器。

故本文以关陇地区中小型秦墓为研究对象，梳理秦墓仿铜陶礼器兴衰进程，通过分析秦用鼎制度的变化，以仿铜陶礼器视角观察秦人从“学周礼”向“废周礼”的转变，尝试讨论其变化原因及所见的秦国社会结构变动。

一、西周晚期秦对周文化的吸收

西周晚期秦文化积极向周文化靠拢，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呈现出周式化特征。从礼器组合看，西周晚期西山坪M2003由三件形制不同铜鼎拼凑三鼎二簋的铜礼器组合，标志着用鼎制度初见雏形。日用陶器方面，秦式深腹鬲具有侈口、深腹、高瘪裆的形制特点，显然沿袭了关中地区西周早中期瘪裆鬲的造型特征，而喇叭口罐的器形则源自周式折肩罐[9]。

从历史文献记载分析，秦人对周文化的学习有着明确的政治动因。《史记•秦本纪》记载，周宣王即位后命秦仲为大夫，这一政治认可进一步促使秦仲效仿周室贵族，出现了“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10]的生活仪制。秦仲去世后，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周人军队大规模的加入推动了文化交流。秦襄公“始国”时“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11]，效仿周人祭祀仪式，以宣告政权合理性。秦文公东进至汧渭之会，即进入关中西部西周时期的京畿要地，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且“尽收周余民而有之”，在与周余民的交往中广泛学习周礼，积极向周文化靠拢，加速了秦文化的转型进程。秦立国前长期生活于戎狄之间，建立初期正处于“诸侯卑秦”的尴尬境地。秦人不仅对周文化心向往之，更要通过袭用周礼制度实现构建“华夏认同”的政治需求。对周文化的吸收，既满足了秦国建立身份标尺的需求，也进一步划分了与戎狄的族群边界。



图一 随葬仿铜陶礼器秦墓占比变化图

秦早期建国与扩张都伴随着对周礼的学习。“秦文化”作为一个阶段性、多含义的文化现象，是在吸收周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12]。

对周礼的系统性学习催生了随葬仿铜陶礼器的特殊实践。通过统计分析春秋早期至战国晚期关陇地区中小型秦墓随葬仿铜陶礼器情况可见（图一）[13]，仿铜陶礼器的发展呈现出明显阶段性：春秋早期处于第一阶段滥觞期，仅约20%墓葬随葬。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处于第二阶段兴盛期。随葬仿铜陶礼器墓葬数占总数比呈递增趋势，至战国早期已有约50%的墓葬随葬仿铜陶礼器。战国中期处于第三阶段衰落期。随葬仿铜陶礼器的秦墓数占比急转直下，战国晚期后几乎消失。

二、秦墓仿铜陶礼器滥觞期

春秋早期甲、乙、丙三类墓葬均出现仿铜陶礼器随葬现象，甲、乙类墓葬与丙类墓葬差异明显。

（一）甲乙类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目前仅在宝鸡南阳墓地发现两座[14]随葬仿铜陶礼器的甲乙类墓葬。南阳M3随葬组合为“铜五鼎+陶礼器组合（鼎5、簋4、壶2、盉1、甗1、盘1）+喇叭口罐2+豆1”，南阳M2为“铜三鼎+陶礼器组合（鼎3、簋4、壶2、盉1、盘1）+豆1”（见图二）。这两座墓葬呈现出“铜鼎单独配置+陶礼器组合”的特殊搭配模式。且与同等级墓葬相比墓葬规模较小，随葬品数量明显偏少，兵器种类少，无车马器，青铜器器形较小且铸造粗糙。仿铜陶礼器存在火候不足、陶质差等工艺缺陷。

从随葬仿铜陶礼器的人群来看，同时期如大堡子山、陇县边家庄、姜城堡、西高泉等地其他铜器墓，均未发现随葬仿铜陶礼器现象。陇县边家庄、姜城堡铜器墓表现出典型周人葬制特征：墓主仰身直肢葬、南北向墓向、无腰坑，随葬完整青铜礼器组合及玉器，使用周人特有的铜罍、棺饰等丧葬礼仪器具，与陇山以西典型秦墓东西向、带腰坑、殉人、屈肢葬、无礼仪器具等特征形成鲜明对比[15]。《史记》记载“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据此推测，边家庄、姜城堡墓主或为归附秦国的周余民贵族。张天恩先生将南阳与边家庄墓葬文化差异概括为“南阳模式”与“边家庄模式”，认为前者源于大堡子山类型[16]，代表春秋时期秦宗室贵族。南阳村位于西周西虢采邑腹地，秦人进入关中后与周余民杂居，其丧葬习俗明显受到周文化影响。由此可见，春秋早期甲、乙类墓葬中，仅有初入关中西部的部分秦宗室贵族采用了铜礼器与仿铜陶礼器相配的组合形式。

这一时期秦人全面系统地学习周礼用鼎制度。但秦人初入关中时，铜器铸造实力仍显薄弱。秦在襄公七年受封诸侯始国前，制作大型铜礼器仍需借用周室之力。襄公七年青铜冶炼中心随周王室东迁而东移，进一步加剧了秦大型青铜礼器制作青黄不接的困境[17]。同时，受铜矿资源、铜器铸造技术不成熟等限制。一方面导致部分随葬铜器器小体薄、制作粗糙。另一方面，使得部分经济水平有限的贵族，选择“以陶补铜”的方式配齐礼器组合。

需要说明的是，春秋早期部分贵族墓葬中出现了特殊现象。南阳M2、M3两座铜器墓在用除鼎外其他陶礼器配齐组合的同时，亦随葬了与铜鼎数量相等的陶列鼎，出现了数量上的重复。魏家崖M133同样出现重复随葬鼎的现象，该墓既随葬五鼎四簋的规范铜礼器组合，又配置了七件陶鼎[18]。这一现象集中出现于春秋早期，一方面可能反映了秦人初入关中时对周礼的认知不足，存在偏差。另一方面或许受到秦人唯“大”尚“多”价值观念影响。例如“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时，追求祭祀品数量，再如墓葬中随葬大量玉石圭等。可见“量”在秦人的价值评价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准，追求“大”和“多”也是秦文化的重要特征[19]。

（二）丙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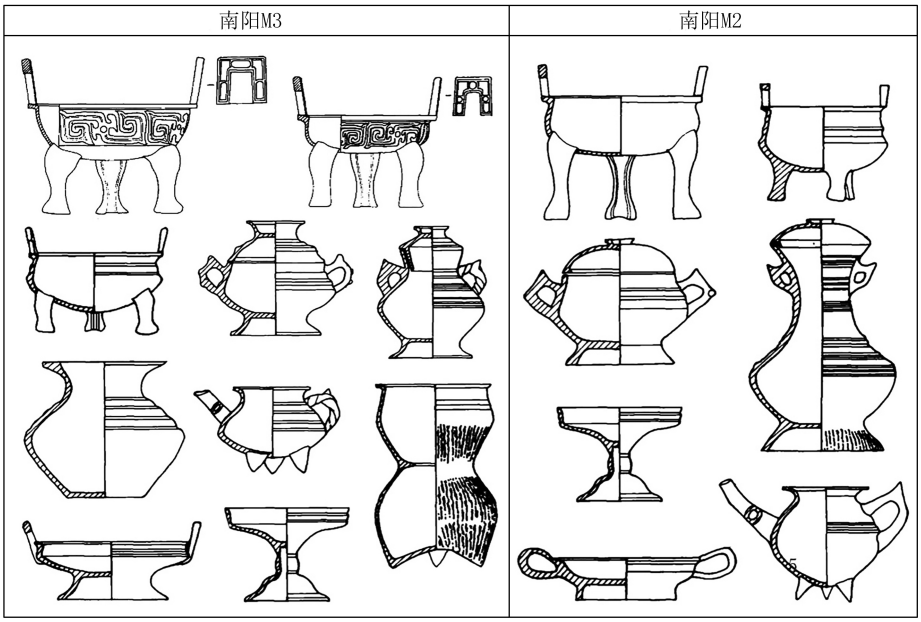
春秋早期在天水毛家坪、宝鸡福临堡、宝鸡西高泉三处遗址共发现13座丙类墓，其仿铜陶礼器组合较为单一，多数墓葬仅随葬1~3件陶鼎。值得关注的是，西高泉墓地与南阳墓地相距仅2公里，两处墓葬出土器物风格高度一致，文化面貌相近，是秦国普通平民墓葬的典型代表[20]。

在为满足学习周礼制度的需求与铸铜技术薄弱的实际情况的双重作用下，春秋早期关中西部、毛家坪遗址等地部分墓葬出现仿铜陶礼器“以陶代铜”现象。就目前已公布材料来看，南阳墓地贵族墓最早随葬仿铜陶礼器，自上而下传播，约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影响到西高泉部分平民墓。这些仿铜陶礼器主要仿自两周之际或春秋早期铜礼器[21]。这一风气也传播至陇山西侧，影响了毛家坪遗址。

关于春秋时期仿铜陶礼器的流行原因，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俞伟超先生认为使用仿铜陶礼器的墓主应是没落的贵族以及获得许可使用士礼的庶人，随着这两类群体人数增长仿铜陶礼器广泛流行[22]。但林沄先生认为仿铜陶礼器的盛行是出于经济考虑及民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图二　南阳M3、M2出土器物

智开化，无区别身份等级的意义[23]。

通过上文对春秋早期秦墓出现仿铜陶礼器现象的分析，笔者认为春秋早期秦国出现仿铜陶礼器，更多应是秦人为满足效仿周礼的需求，又受限于自身铜资源短缺、铸铜技艺有限的现实条件而做出的选择。

三、秦墓仿铜陶礼器兴盛期

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秦墓随葬仿铜陶礼器的墓葬比例呈现显著增长态势。

（一）甲类

甲类墓葬代表的高等级贵族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通常不随葬仿铜陶礼器，铜礼器组合完整，且整体器物组合很少变化，具有很强的一致性。甲类墓葬除葬式不明者以及毛家坪M2059为微屈葬式，其余墓主皆为仰身直肢葬，推测应为嬴姓宗族成员，依靠血缘关系世袭贵族。甲类墓葬规整的铜礼器组合表现出对自西周以来以宗法制为核心、维护贵族身份和地位为目的的用鼎制度的重视[24]，毛家坪M2059、孙家南头M126、户县宋村三号墓等皆符合鼎制规范，未出现东方列国常见的僭越，亦不使用仿铜陶礼器。

（二）乙类

这一阶段乙类墓葬变化较大，从数量上看，春秋早期20%的乙类墓葬随葬仿铜陶礼器，至战国早期仅个别乙类墓葬未随葬仿铜陶礼器。

从组合形式来看，乙类墓葬随葬仿铜陶礼器功能发生重要转变，由以陶礼器补齐铜礼器转向随葬全套仿铜陶礼器组合。

关陇地区目前已公布的乙类墓葬可按照鼎数分为三个级别，分别对应元士、中士、下士。

1.三鼎墓

（1）铜三鼎（组合完整或不完整），不随葬仿铜陶礼器。

如毛家坪M2204、福临堡M1、阳平镇M1等。这类墓葬数量随时间发展递减，墓葬规模在春秋中期明显大于同期随葬仿铜陶礼器墓，而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与随葬仿铜陶礼器墓差别不大。

（2）铜三鼎（组合不完整），随葬仿铜陶礼器补充组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表一　　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乙类墓葬登记表

遗址	墓葬	墓葬面积	青铜礼器	仿铜陶礼器	随葬兵器	年代
福临堡	M1	114.19	铜鼎3、铜簋2、铜甗1、铜方壶2、铜敦1、铜盘1、铜匜1			春秋中期
毛家坪	M2058	121.1	铜鼎3、铜簋4、铜盂1、铜匜1、铜盘1、铜甗1、铜方壶2		铜剑3、铜戈3、骨镞21、	春秋晚期
毛家坪	M2204	101.85	铜鼎3、铜敦1、铜盘1、铜匜1、铜甗1、铜盂1		铜戈1、铜刀1、铜剑1	春秋中期
八旗屯	CM9*	139.7	铜鼎3、铜壶2、铜豆2、铜盘1、铜甗1、铜敦1		铜剑1	战国早期
八旗屯	CM2	不明	铜鼎3、铜簋1、铜盘1、铜匜1、铜甗1			春秋中期
阳平镇	M2	不明	铜鼎3、铜簋4、铜壶2、铜盘1、铜匜1			春秋晚期
阳平镇	M1	99.22	铜鼎3、铜簋4、铜壶2、铜盘1、铜匜1			春秋晚期
大堡子山	06LDIM25	130.9	铜鼎3、铜甗1、铜盂1		短剑1	春秋中期
八旗屯	BM27	39.5	铜鼎3、铜甗1、铜盂1		铜戈2、铜矛1、铜剑1、铜镞18、铜盾泡6、弓囊朽痕1、盾朽痕2	春秋中期
孙家南头	M160	78.43	铜鼎3、铜甗1、铜盂1			春秋晚期
毛家坪	M1049	84.32	铜鼎3、铜甗1		戈1、斧1、箭镞6	春秋中期
洪塬	M1	不明	铜鼎3、铜甗1			春秋中期
大堡子山	06LDⅢM1	63.66	铜鼎3、铜甗1		铜柄铁剑1、箭镞4	春秋晚期
凤翔高庄	M10	198.14	铜鼎3、铜壶2、铜甗1、铜盂1	簋2、壶2、匜1	铜戈1	春秋晚期
毛家坪	M2111	141.96	铜鼎3、铜盂1、铜甗1	簋1	铜剑1	春秋晚期
武功赵家来	M1	45.83	铜鼎3、铜盂1	鼎1、簋2、壶2、甗1		春秋晚期
孙家南头	M161	32.72	铜鼎2	鼎1、壶2		春秋晚期
八旗屯	AM9*	29.15	铜鼎1、铜盂1、铜甗1	鼎2、盘1、匜2		春秋中期
上孟村	M27	73.37	铜鼎1、铜甗1	鼎2		春秋中期
圆顶山	98LDM3*	74.88	铜鼎1、铜尊1	鼎2	铜戈1、铜剑1	春秋中期
毛家坪	M2146	66.78	铜鼎1	鼎2、甗1	箭镞1	春秋中期
高庄	M49	23.2	铜鼎2、铜甗1、铜壶2、铜盘1、铜匜1、铜盂1	簋2、壶2、盘1、匜1		战国早期
高庄	M48	31.25	铜鼎1、铜甗1、铜盘1、铜匜1、铜敦1	鼎1、簋2、壶2、甗1、盘3、匜1		战国早期
孙家南头	M81	40.98	铜鼎1、铜甗1、铜盂1		铜镞1组、铜斧1、铜戈2	春秋中期
孙家南头	M83	24.61	铜鼎1、铜盂1			春秋中期
毛家坪	M2179	69.69	铜鼎1			战国早期
高庄	M18	76.68	铜匜2、铜敦1、铜三足釜1	鼎2、簋2、壶2、甗1、盘1、匜1	铜戈1、铜剑1、铜矛1	战国早期
西沟道	M3*	不明	铜匜1	鼎1		春秋晚期

注：*表示墓葬曾被盗

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其中毛家坪M2111、凤翔高庄M10墓葬面积远超其他三鼎墓，同时随葬铜剑、铜戈等兵器。表现出经济及军事实力。

(3) 铜一、二鼎墓，共出包括陶鼎在内的仿铜陶礼器补齐组合。

主要流行于春秋中期，如孙家南头M161、长武上孟村M27、毛家坪M2146。其规模、随葬品数量、铜器质地等方面均逊于铜三鼎墓葬。其中长武上孟村M27随葬“铜一鼎+陶二鼎”，并随葬车马坑。反映出墓主身份具备使用铜三鼎资格，但经济上捉襟见肘，选择以仿铜陶礼器代替。且除毛家坪M2146发现1件箭镞，其余墓葬均未见随葬兵器。

可见三鼎墓中，以陶鼎补齐三鼎之数的墓葬多源于经济压力，而部分铜三鼎墓随葬仿铜陶礼器并非出于经济考量，可能是受到新观念的影响。

2.二鼎墓

集中流行于战国早期，均发现于凤翔高庄，且仿铜陶礼器组合相对完整。其中M49、M48随葬铜鼎，但墓葬规模远小于仅随葬陶鼎的M18。这一现象反映出：一方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面，完整的礼器组合体现对礼制的遵循。另一方面，经济军事实力更强的M18墓主受身份限制而没有用鼎权力。可见战国早期秦国依然严格遵循用鼎制度，明确限制用鼎身份等级。

3.一鼎墓

通常铜礼器组合不全，同时不随葬仿铜陶礼器。

从等级上看，各级墓葬在数量和组合形式上依旧遵循旧制。即便如战国早期高庄M18这类具备一定经济军事实力的墓葬随葬了其他青铜礼器，但依旧没有冲破随葬铜鼎的等级界限。

从时间来看，春秋中期以经济困难的铜一、二鼎墓为主，以陶代铜的行为更多出于成本考虑。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具备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贵族群体主动选择随葬仿铜陶礼器。“陶礼器补充组合”模式已从早期的经济替代性选择转变为适应礼制调整的流行趋势。这一发展趋势表现出乙类墓主使用仿铜陶礼器群体及目的的转变，其本质是仿铜陶礼器伴随着阶级流动和新丧葬观念的传播，由丙类墓葬反向渗透至乙类墓葬，自下而上成为流行趋势。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秦国甲乙类贵族墓严格遵守用鼎制度，数量和组合上未有僭越。东方列国常见的鼎制僭越，如随葬多套列鼎的现象未在秦国出现。秦墓表现出比同时期东方姬姓国家的墓葬更遵循文献中所记载的用鼎制度[25]。在这一前提下，秦国士一级贵族成为随葬仿铜陶礼器的主体人群之一。仿铜陶礼器在这一阶层迅速扩散。最初以“补齐铜礼器组合”为目的，随后逐渐成为流行趋势。林沄先生在讨论仿铜陶礼器一类非实用随葬器物的盛行时提出“在现实生活中，积极使用较廉价的非实用明器首先是财力不足的人。但在东周后期，在不少随葬了大量珍贵器物的大墓中，也有成批的非实用明器，这只能说明随葬非实用明器已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习俗或社会意识。”[26]仿铜陶礼器在乙类墓葬中的扩散，一方面源于中下层贵族观念的改变，另一方面受社会阶层上下流动影响。

（三）丙类

丙类墓葬数量发展迅速，占墓葬总数比例稳定增长。反映出仿铜陶礼器在中小型秦墓中出现后逐渐流行，并成为主要随葬器物组合形式之一。从组合形式来看，丙类墓葬仿铜陶礼器组合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天水地区如毛家坪遗址墓葬仿铜陶礼器组合主要为鼎、甗或鼎。而关中地区仿铜陶礼器组合形式更多样，涵盖鼎、簋、盘、匜、甗、壶等器类，且存在多种搭配方式，其中以鼎、簋、壶、盘、匜、甗的完整组合或单鼎组合最为常见。

对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丙类墓葬数据进一步分析得出：丙类墓葬随葬陶鼎数量与墓葬规模相关性较弱，陶鼎数量与随葬品数量关系不大。这表明丙类墓葬中陶鼎的数量并未如铜礼器组合中的铜鼎那样具有明确的等级区分意义，尚未形成固定的等级秩序。此外，仅有12.5%的丙类墓葬随葬兵器，且均出自陇县店子墓地。可见除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陇县店子墓地外，丙类墓葬的墓主群体并未广泛参与军事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除天水地区仿铜陶礼器组合形式单一外，其他地区仿铜陶礼器组合形式与墓葬中是否随葬陶囷表现出强关联性——陶囷往往出现在仿铜陶礼器组合完整的墓葬。如表二所示，随葬仿铜陶礼器器类数越多、组合越完整，同时随葬陶囷的概率就越大。其中个别1~3类仿铜陶礼器墓随葬陶囷的特殊现象集中出现在陇县店子墓地，数量较少。

陶囷作为春秋战国秦墓中极具地方特色的随葬器物，最早出现于咸阳任家咀、陇县店子等地的春秋中期秦墓，至战国早期已在关陇地区中小型秦墓中较为流行。墓葬中的陶囷模型作为储粮明器，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墓主生前财富（尤其是粮食储备）以及对粮食生产、土地控制能力的反映。

由此可见，丙类墓葬中随葬陶囷的群体，往往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较强经济实力的阶层，他们严格遵循仿铜陶礼器的使用规范。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表二　丙类墓葬随葬陶礼器组合完整度和陶囷关系分析表

仿铜陶礼器件数	仿铜陶礼器组合	墓葬总数	随葬陶囷墓葬数	比例
1	鼎	10	0	20%
	簋	2	1	
	壶	2	0	
	甗	6	3	
2	鼎簋	6	1	21.05%
	鼎壶	1	1	
	鼎甗	10	0	
	壶匜	2	2	
3	鼎簋壶	11	4	14.81%
	鼎簋甗	5	0	
	鼎壶盘	2	0	
	鼎匜甗	1	0	
	鼎甗盘	1	0	
	簋壶甗	3	0	
	壶盘匜	2	0	
	盘匜甗	1	0	
	簋甗匜	1	0	
4	鼎簋壶匜	5	4	47.83%
	鼎簋壶甗	13	5	
	鼎簋盘匜	1	0	
	鼎簋壶盘	1	1	
	鼎壶盘匜	1	0	
	簋壶盘匜	1	1	
	壶甗盘匜	1	0	
5	鼎簋壶甗盘	3	0	58.33%
	鼎簋壶盘匜	3	3	
	鼎簋壶匜甗	3	2	
	簋壶盘匜甗	2	2	
	鼎簋甗盘匜	1	0	
6	鼎簋壶盘匜甗	32	26	81.25%

陶礼器组合的规整化，暗示着新兴地主阶层的崛起，试图借礼器标准化建构身份认同。但同时，区别于鼎、簋等成套配置的礼器表示出的传统等级制度，陶囷是以指向经济的社会价值判断准则为代表的具有明显现实性的价值取向的反映，体现秦人实用主义价值观念[27]。陶囷在丙类墓葬中流行，也正是这一观念在这一阶层盛行的表现。在遵守丧葬礼制规范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具有现实价值的丧葬观念。

秦人严格遵循周礼用鼎制度、学习周礼并非意味着思想文化上亦与周文化完全保持一致。秦人对周文化的学习吸收是全面的，但同时秦人对周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全盘接纳，而是片段的、局部的、有选择的[28]。秦人在制度层面严格遵循用鼎制度等级秩序，控制数量。同时在实践中产生了仿铜陶礼器的灵活创新。对周礼的学习亦是从秦国的实际需求出发，选择更合适的治国之法，体现了秦人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

四、秦墓仿铜陶礼器衰落期

战国中晚期，仿铜陶礼器墓发现数量较少。主要集中于咸阳、宝鸡、陇县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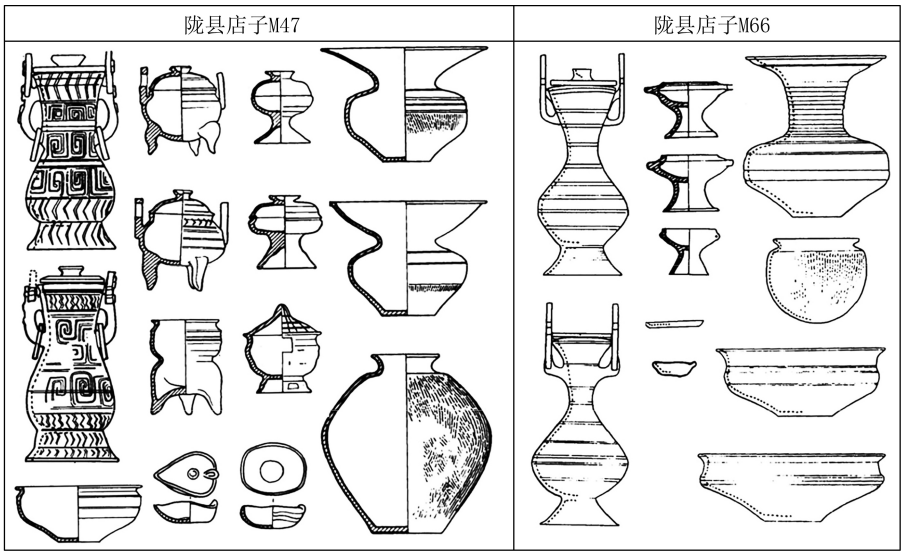
咸阳塔儿坡墓地发现随葬仿铜陶礼器墓数量最多。墓地以丙类和丁类的中小型墓葬为主，年代集中于战国晚期至秦代。出土仿铜陶礼器以鼎、盒、壶为主，器物形制与三晋两周地区同类器物如出一辙[29]，且仿铜陶礼器、日用陶器器身发现带有不同制陶作坊的陶文，属于进入流通的商品，按需选择。是否随葬仿铜陶礼器与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可能具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30]。战国中晚期咸阳地区人口构成复杂，塔儿坡墓地人群来源广泛，有大量外迁人口，具有特殊性。相较之下，较为纯粹的秦人墓地战国中晚期基本不随葬仿铜陶礼器[31]。

陇县店子墓地战国中晚期发现的仿铜陶礼器墓数量仅次于塔儿坡墓地。统计显示，店子墓地战国中期、晚期分别有23.08%、10%的墓葬随葬仿铜陶礼器，尽管仍有一定比例墓葬随葬仿铜陶礼器，但数量明显减少。其组合形式虽然延续以往的模式，保持着鼎、簋、壶、盘、匜的组合形式。但无论是组合完整性还是器物数量，远不及战国早期墓葬规范，且器型亦简化（图三）。陇县店子墓地级别较低，仅有随葬仿铜陶礼器或日用陶器的小型墓。加之店子墓地地处陇县，与雍城、咸阳等核心区域距离较远，文化亦有差异[32]，具有一定滞后性。所以在战国中晚期仍少部分延续了随葬仿铜陶礼器的习俗。

宝鸡八旗屯、凤翔高庄等地亦有少量仿铜陶礼器墓。例如高庄M24、M27，但仅随葬少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图三　陇县店子战国早期M47、战国中期M66陶器组合

量陶鼎、陶壶，不构成规律组合。且器物制作粗糙，也不见此前流行的彩绘装饰。

可见战国中晚期随葬仿铜陶礼器的秦墓呈现整体衰落趋势，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数量锐减。仿铜陶礼器墓在墓葬总数中的占比从战国早期的50%大幅下降至10%~20%，分布范围收缩至咸阳、陇县、宝鸡等地。其中咸阳塔儿坡墓地发现最多，陇县店子墓地数量次之，宝鸡八旗屯、凤翔高庄等地仅有零星发现。第二，组合不完整。不再有固定模式，如塔儿坡墓地以鼎、盒、壶为主，陇县店子墓地虽延续鼎、簋、壶、盘、匜组合，但完整性和器物数量远不及战国早期规范，宝鸡、凤翔等地墓葬甚至不构成规律组合。第三，器型简化。曾经流行的秦式彩绘仿铜陶礼器几乎销声匿迹，现存器物形制多与三晋两周地区相似，且制作粗糙，部分器型简化。

战国中期后，用鼎制度的崩坏在东方与秦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东方各国对礼制的破坏是以僭越礼器等级、数量和组合的混乱无序为表现，但仍是在周礼框架下，其本质是对原有价值观的认可。而秦国此时出土青铜礼器墓葬寥寥可数，仿铜陶礼器亦趋消失，秦国直接改变了鼎制传统形式。正如俞伟超先生在讨论东方列国和秦国用鼎制度差异时指出，秦国鼎制的特殊变化是经济基础的变动以及由此引起的等级制度的更改，即商鞅变法二十等爵制度所造成的。同时秦受周人制度束缚较少，较彻底地破坏了周人鼎制[33]。

从春秋早期“学周礼”到战国中期“废周礼”，用鼎制度的变化反映出秦人对周礼采取“应时而变”的实用主义策略。既借助周礼获得华夏认同，又能在社会转型时果断抛弃其桎梏，对周礼的学习与废弃皆是从秦国实际需要出发。《商君书·更法》中记载，秦孝公担忧“更礼以教百姓”引发争议时，商鞅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论断，将礼制工具化。并以“三代不同礼而王”的观点，为彻底废除周礼提供了理论支撑。秦国早期通过“用周礼”构建统治合法性，战国中期后却以“废周礼”推动社会转型，大力推行二十等爵制，奖励耕战，形成了新的社会分配制度。

这种策略的核心，是秦人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价值观念，是对自我以外实际世界的探求和自身物质需要的索取[34]。秦人将礼制视为治理工具，春秋早期“以陶补铜”是资源匮乏下的权宜之计，战国中期废弃周礼亦是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度创新的必然选择。当东方列国陷入礼制形式主义时，秦国通过制度创新开辟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实用主义导向的变革方式，最终成为其统一天下的关键制度优势。

五、仿铜陶礼器兴衰所见秦国社会结构变动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传统等级制度及其所属的用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动摇[35]。

从仿铜陶礼器的视角来看，其反映出的社会结构变动主要表现在社会阶层结构变化。

首先是新群体的产生。随葬仿铜陶礼器的丙类墓的出现标志着在使用铜礼器与日用陶器之间诞生了新的群体，即处于统治集团与普通平民之间的阶层[36]，通过随葬陶礼器组合参与礼制生活。

其次是阶层的上下流动以及统治集团的变化与重组。晁福林先生曾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面貌和社会群体出现了新局面，具有新、旧交替，上、下易位的特点[37]。秦国在这一时期统治集团也产生了变化与重组，一些原本仅能随葬仿铜陶礼器的人群通过军事活动使得政治地位上升，成为能够随葬铜礼器的新贵族。一部分贵族政治地位及经济水平下降而选择用部分仿铜陶礼器代替铜器。这一现象表明森严的等级制度开始松动，产生了阶层的上、下易位。随着时间推移，社会流动速率逐渐加快。秦国国家权力系统和机制内，没有封闭的、排外的宗法制，不排斥外人进入统治集团。从而提供了进入统治集团新渠道，打破了血缘为纽带的统治桎梏，改变了社会上层的构成与来源，选择标准逐渐从世袭向个人能力转变，形成了具有开放性的统治集团，各阶层间界限逐渐模糊。

第三是新的社会结构形成。当秦国推行变法改革，仿铜陶礼器作为周礼载体随之消亡，新的等级秩序逐渐形成。

仿铜陶礼器产生、兴盛、消亡的兴衰历程与社会结构三个变动紧密呼应，仿铜陶礼器作为周礼用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等级制度与分配制度的物化表达。秦国从使用到废弃仿铜陶礼器、学习周礼建立起等级秩序到废弃周礼推行二十等爵制度，满足了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是其面对社会结构变动，实用主义为价值导向影响下实现的制度转型。

六、结语

仿铜陶礼器作为周秦礼制变革的物质载体，其兴衰历程深刻映射了秦国社会结构的动态变化和秦文化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念。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春秋至战国时期关陇地区中小型秦墓的考古材料，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秦墓仿铜陶礼器的使用呈现“自上而下普及”与“自下而上冲击”的双向互动。仿铜陶礼器的繁荣发展，一方面受周礼等级观念、丧葬观念影响，同时也是社会阶层上下流动加速的结果。

第二，仿铜陶礼器的兴衰进程与周秦礼制转型相适应。春秋早期秦人初入关中地区，部分贵族在铜资源匮乏与技术滞后的困境中为满足“学周礼”的需求，选择“以陶补铜”完成随葬礼器组合。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秦墓较东方列国更严格遵循用鼎制度，仿铜陶礼器发展达到鼎盛。战国中期秦国商鞅变法建立新的等级制度废弃周礼，用鼎制度崩溃，陶礼器也随之消亡。

第三，从“用周礼”到“废周礼”的转型过程反映了秦人对待周礼的实用主义取向，也是秦国社会权力结构重构的必然选择。秦人早期为获取华夏正统性认可，效仿周礼严格规范器用组合。后期弃用则是为适应社会结构变动，构建新制度。

同时，秦国仿铜陶礼器与用鼎制度的演变轨迹与东方列国形成鲜明反差。当三晋、楚、齐等国仍在周礼框架下局部调整时，秦国战国中晚期用鼎制度崩解、陶礼器骤衰，彻底割裂周礼传统。秦国兴起于华夏西部边陲，受中原文化和戎狄文化的双重影响。秦国作为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外缘接纳中心区的文明成就，通常能少有历史包袱，锐意拓进，往往后发制人，崛起为新的统领者[38]。秦国在发展过程中“应时而变”，走在了制度创新的前列。

附记：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资助（项目编号DF2023ZD15）；又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南林州大菜园东周墓地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4AKG00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仿铜陶礼器的概念由邹衡先生首次提出，邹衡先生在《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中将陶爵、陶觚分为两种系统，一类为实用陶器或仿实用陶器，另一类为仿铜器。提出了仿铜陶礼器的概念。康石磊借鉴铜礼器的界定方式，提出三点条件：1.仿铜陶礼器应满足年代上不早于被模仿的铜礼器，2.器类在铜礼器范围内，3.组合及使用方式与铜礼器相似。本文采用这一标准。

[2]钱心怡：《对二里头、二里岗文化铜陶相似器的观察与分析》，载《中原早期青铜时代——聚落与礼器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23年。

[3]张恒：《西周仿铜陶礼器墓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5月。

[4]张亮：《东周社会结构演变的考古学观察》，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

[5]陈洪：《关中秦墓出土陶器编年研究》，《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

[6]王学理、梁云：《秦文化》，文物出版社，2001年。

[7]吴十洲：《两周礼器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

[8]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第1期；滕铭予：《关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王学理、梁云：《秦文化》，文物出版社，2001年；梁云：《秦墓等级序列及相关问题探讨》，《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

[9]梁云：《早期秦文化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10]（汉）毛亨传，（汉）郑玄笺：《毛诗传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1]（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12]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3]该数据通过统计宝鸡南阳、宝鸡魏家崖、宝鸡西高泉村、宝鸡姜城堡、宝鸡福临堡、孙家南头、宝鸡谭家村、宝鸡邓家崖、宝鸡郭家崖、宝鸡斗鸡台、凤翔西沟道、凤翔高庄、凤翔南指挥村、宝鸡阳平镇、宝鸡茹家庄、宝鸡八旗屯、陇县边家庄、礼县大堡子山、灵台景家庄、灵台洞山、天水毛家坪、长武上孟村、长武碾子坡、礼县西山坪、礼县圆顶山、陇县店子、天水放马滩、平凉庙庄、长安客省庄、咸阳任家嘴、西安半坡、咸阳塔儿坡等地已公布秦墓材料墓葬总数、随葬仿铜陶礼器数得出，墓葬分期参考原报告或简报。

[14]宝鸡市考古队、宝鸡县博物馆：《陕西宝鸡县南阳村春秋秦墓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7期。

[15]张天恩、刘锐：《春秋早期关中周余民及文化遗存浅识》，《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第28辑，三秦出版社，2021年。

[16]同[15]。

[17]陈平：《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凤凰出版社，2004年。

[18]源自宝鸡魏家崖遗址2024年发掘资料，材料尚未发表。

[19]同[12]。

[20]张煜珧：《秦都平阳地区春秋早期秦墓相关问题研究》，《文博》2023年第4期。

[21]同[20]。

[22]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篇》，载《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23]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24]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3年。

[25]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文物出版社，2008年。

[26]同[23]。

[27]张颖岚：《秦墓出土陶困模型及相关问题研究》，《秦文化论丛》第七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28]王子今：《秦扩张史——土地与民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29]同[24]。

[30]滕铭予：《咸阳塔儿坡秦墓地再探讨》，《北方文物》2004年第4期。

[31]同[25]。

[32]赵化成：《陇县店子墓地读后》，《考古》2000年第1期。

[33]同[22]。

[34]同[19]。

[35]同[22]。

[36]同[24]。

[37]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1年。

[38]冯天瑜：《周制与秦制》，商务印书馆，2024年。

（下转第 130 页）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Function of the *gu* Writing Tablet from Tomb M274 at Zhengjiahu and the Identity of Its Occupant

ZHANG Wei
(Jinan, Shandong 250199)

Abstract: The wooden *gu* writing tablet unearthed from tomb M274 in Area C of the Zhengjiahu site at Yunmeng bears a recorded text of a *zongheng* strategem. Such strategems, which emerged from the vertical-horizontal alliance movements of the mid-to-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may have originated either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words and actions of *zongheng* rhetoricians kept by court scribes, or from the writings of the strategists themselves for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arts of persuasion. Since Tomb M274 dates to a time before the fall of the Qin Dynasty, it is highly unlikely that the stratagem recorded on the wooden *gu* was drawn from Qin official archives; rather, it should be a teaching text composed by a *zongheng* strategist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arts of persuasio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rough the early Western Han, there existed a military system in which strategists accompanied armies on campaigns. Moreover, Zhengjiahu, where the wooden *gu* was unearthed, was a strategic stronghold under Qin control in the Chu region during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t is therefore plausible that the occupant of Tomb M274 was a strategist serving in the Qin forces stationed at this location, and the wooden *gu* was an object he used in life for practicing and mastering the arts of persuasion. The choice of a wooden *gu* as the writing medium for such texts can be attributed to its practical advantages, including ease of manufacture, high character capacity per unit, and, in particular, portability.

Keywords: wooden *gu* writing tablet from Zhengjiahu; policy essays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trategists

（责任编辑、校对：马志亮）

（上接第 125 页）

Rise and Fall of Bronze-imitation Pottery Vessels in Qin Tombs: with a Focus on the Guanzhong-Longyou Region

ZHAO Keyi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Bronze-imitation pottery ritual vessels, used as ceramic substitutes for bronze ritual vessels, appeared earlier in Qin tombs than in the eastern states. This paper examines such vessels from small- and middle-sized Qin burials in the Guanzhong-Longyou region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Their development falls into three phases, reflecting a shift "from learning Zhou ritual to abandoning it." The early adoption of Zhou ritual was driven by the Qin's desire to establish their Huaxia orthodoxy, while its abandonment after the mid-Warring States period was a response to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bronze-imitation pottery vessels; Guanzhong-Longyou region; Qin tombs; Zhou rituals

（责任编辑、校对：凡国栋）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S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